



五四时期恽代英同志 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

王宗华 张光宇 欧阳植梁

革命先烈恽代英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五四时期就开始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今天，缅怀恽代英同志五四时期的革命实践，探索他的思想的发展，学习他不断追求真理、重视实践的革命精神，对于我们进行新的长征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一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政权，在他的反动统治下，复辟逆流日益高涨，民族危机更加深重。辛亥革命在人们心中燃起的“民主”与“富强”的希望破灭了。但是辛亥革命必竟推翻了清朝皇帝的统治，沉重地打击了长期延续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精神高涨起来。袁世凯和守旧分子掀起的复辟逆流不能不首先激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反抗。于是一个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地兴起来了。

恽代英同志当时正在武昌中华大学学习(1913—1918年)，他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努力学习新思想，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同时在同学中先后组织“诗社”、“我们的俱乐部”、“互助社”、“仁社”、“新声社”等社团，创办《道枢》杂志、《光华学报》、《互助》等刊物，并在《新青年》、《端风》、《青年进步》、《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新文化。但是，这时恽代英同志象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思想是复杂的。因为他们当时还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里寻找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而一时又还缺乏批判的能力，各种思想都可能对他们发生影响。他们把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都接受下来，于是就形成思想上复杂的状况。当时《新青年》对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兼容并包，就是先进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状况的反映。《新青年》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又反过来促进了他们思想的复杂化。恽代英同志当时也是深受《新青年》的影响的。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曾经说过：“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1〕}一九一九年初，他在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时在学生中组织的“新声社”曾给《新青年》写过一封信。他们在这封信中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思想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象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起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个《新声》。……我们总觉得是当尽

的责任。……而且还有一层，我们虽然得了这条正路，然而并没有走到这条路上来。我们办这《新声》就是想一方面请人家引导我们向这条路上走，一方面希望别人也都跟着向这条路上来。”〔2〕很明显，这封信反映了《新青年》对恽代英同志和“新声社”其他成员的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夕，恽代英同志就受到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庸俗进化论、改良主义等的影响，使他的思想呈现复杂的状况。但是从这时到五四爱国运动期间，民主主义思想仍然是他思想的主流。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是改造社会的“福音”。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强调他“素来主张人类平等”〔3〕并认为“故今言教育，最妙莫如以平等博爱之真精神，贯注生徒。”〔4〕他正是运用这种民主主义思想作武器对封建制度进行抨击的。

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发表了《结婚问题之研究》一文，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倡结婚自由。他说：“结婚主权仍应属于结婚之男女自身，此理由极简单。盖结婚为男女自身之事，故当以男女自立为正也。谓应以父母代之主婚者，乃不得已而设之补偏救弊之法。今偏既不能补，弊既不能救，则父母代之主婚为不合理。”〔5〕他批判了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指出：“孟子之言，非从根本上打破不可也。孟子之言既从根本上打破，则结婚主权不得属于男女之父母可知矣。”〔6〕

恽代英同志还批判了封建迷信思想，宣传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五四”前夕，他发表了《新无神论》、《论信仰》等文，运用科学思想反对封建迷信，宣传无神论。他明确表示他是“主张无神者”〔7〕，他根据人类对自然现象认识的发展说明“天下为无神，凡言有神者妄也。”〔8〕他说：“吾观于已往之历史，则宁以为无神。何也？昔者吾人乍见雷电之击人，则以为神主张之，今之略习物理者，则皆晓然以为无神矣。昔者乍见日月之蚀，亦以为神主张之，今之略习天文者，则亦晓然以为无神矣。”〔9〕他认为将天下事物之“不可得而解析者，则谓为不可思议而归之于神”〔10〕是错误的。他指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不过一时之现象，非真不可思议也。凡所谓不可思议者亦谓为上帝之所主持，永远超越人类认识范围之外，不过为一般尚未发明之科学原理所支配，因暂不为今人之所知耳。人欲全知天下事事物物，实非绝对不可能之事。”〔11〕因为人类的“认识范围者非一定不变，而随世界之文明，人类之智慧，以渐次扩张者也”〔12〕，“世界文明愈进化，人类智慧愈精确，则其认识之范围愈扩张，……自昔之视今而言之，则昔之所以为不可思议者，在今日已有一部分变而为可思议，又安知今之所以为不可思议者，在他日不更有一部分又变为可思议，或竟全部尽变为可思议乎？圣之以为有神者，在今日已有一部分可以科学解析之。又安知今之所以为有神者，在他日不更有一部分亦可以科学解析之，或竟全部分尽可以科学解析之乎？”〔13〕他由此进而指出：“凡由不可思议而变为可思议，其先必以怀疑思想为之先驱。”〔14〕这就是说，要冲破封建迷信思想以至一切旧教条的束缚，首先要大胆解放思想，对它的存在提出怀疑。他号召人们从封建迷信和一切旧教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他坚决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他说：“异哉吾国学者，于此日此时乃欲大倡信仰之说于吾国，宗教也，国教也，纷囷不可辨晰。”〔15〕他质问那些主张建立孔教的守旧分子说：“自欧风东渐，彼数百年前之宗教史，有足使吾人羡慕者耶？或西人既至今日，尚任其宗教自由存在，自由传播，即足为吾人应建设宗教，应建设国教之惟一理由耶？或有欲为大教主大牧师，以俯享一国人之尊敬崇拜者耶！”〔16〕他要求这些守旧分子“恍然知宗教之价

值,在今日且不足道,而悟于其所主张国教之非也。”〔17〕

恽代英同志不仅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反对迷信思想,宣传无神论,同时还直接宣传了唯物主义思想。一九一七年三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物质实在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不同派别哲学家对于物质世界是否客观存在这个问题的观点,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当时还没有接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的论述自不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但是他认为“物质必为实在”〔18〕,因为“吾人之知觉必待感官受外物之刺激而后发生。”〔19〕由此“遂决为外界必有实在之物质。”〔20〕同时,他还指出:“客观之物,虽待主观健全,始足以认识感觉之。即令主观不健全,不能认识感觉,其客观之物之存在如故,不可以为离主观而遂无客观也。”〔21〕这表明他当时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

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当时还宣传了唯物论的认识论。他在同年十月发表的《经验与智识》一文中,论述了知识的来源等问题。他认为经验“为一切智识之源。”〔22〕“智识未有不从经验中得来者也。凡可名为智识者,或由吾人简单之经验而认识之,或由吾人复杂之经验而推知之。前者如声色臭味之辨别,后者为各种学术之原理。总之,凡可称为智识者,盖渺不可得也。”〔23〕因此,他反对有所谓“天启之智识。”他说:“天启云云,揆之于理,断不能合。”〔24〕对于知识是否可以由遗传性传之于子孙的问题,他认为,“吾人普遍所谓智识,与其由家庭遗传中得来,不如谓由社会数千万年互相传授之学问中得来。”〔25〕

恽代英同志还认为,经验虽为一切智识之源,但“单纯之经验,每不正确。”〔26〕要对经验加以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他说:“徒堆积经验而不加以研究者于智识无益。”〔27〕又说:“无论如何富于经验之人,苟于其各种经验不能将其原因结果一加研究,即对智识无丝毫之益。”〔28〕

恽代英同志关于认识论的这些言论,不仅基本上正确地说明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个认识论的唯物论观点,而且对认识不能停顿在经验上,必须经过思考作用使之深化的道理也有所说明。他宣传唯物主义和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这些言论,对于当时流传的各种唯心主义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在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幻灭了的情况下,有一些知识分子处在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中。针对这种情况,恽代英同志提倡积极的进取精神。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他发表了《向上》一文和《真男儿》这篇小说。他呼吁人们不要自暴自弃,变成时代的落伍者,而要兢兢业业,奋发自励,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他指出,一个人应当做“有长进”的人,应当自问:“今年比去年长进是在那里,明年比今年又预想要怎样的长进。”否则,那你就是“自暴自弃,糟踏了造物给你的天资”。他号召:“在我们没盖棺材板以前,谁能限制我们的事功德业?有胆子的,向前走吧!有力量的,向前走吧!”〔29〕正是由于他的这个思想,他十分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在组织“互助社”、“仁社”时,都提出了社员信守戒约,并要求社员经常据以“自省”和相互督促。

恽代英同志还撰写和翻译了一些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如《细菌致病说》〔30〕、《卫生之婴儿哺乳法》〔31〕等,对于传播科学思想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恽代英同志在运用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思想作武器,反对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活动。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投降卖国,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日浪潮,恽代英同志挺身而出,

组织中华大学的同学，宣传群众，检查和抵制日货，举行反帝爱国的示威游行。

从以上所述，可见恽代英同志是积极地参加了“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并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这就为他参与发动和领导武汉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所以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一传到武汉后，他就立即起来发动武汉地区的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恽代英同志写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并于五月七日在中华大学学生运动会上散发。他在传单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阴谋，他说：“……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32〕他呼吁人们起来进行坚决斗争。学生们看了传单后，个个悲愤填膺，纷纷要求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在恽代英同志等发动下，九日，武昌各校学生代表在中华大学集会，决议成立武昌学生团，恽代英同志为学生团写了宣言书。十四日，武昌学生团代表在文华大学开会，决定改武昌学生团为武汉学生联合会，并修改原学生团宣言书。十七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在中华大学开成立大会，通过宣言书，并决议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十八日，在学联领导下，各校学生三千余人举行了示威游行和演讲。十九日，各校学生又到街头广泛散发恽代英同志写的《呜呼青岛》的传单。在这张传单中，恽代英同志满怀民族义愤地写道：“呜呼青岛！呜呼山东的主权！呜呼我中国未来的前途！贪得无厌的日本人，没有一天忘记了我这地大物博的中华民国，……所以对于中国的土地，夺了台湾，又夺大连旅顺，现在又拚命来夺中国的主权了。”他号召人们“莫买日本货，亦莫卖日本货，把日本商业来往，排斥个永远干净，莫伺候日本人，向日本要饭吃。是有血性的，饿死了亦吧，为什么甘心做奴隶；多看看报纸，亦晓得外埠有人性的同胞做些什么，好学个榜样。”〔33〕

“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是五四爱国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斗争方式。恽代英同志及时地发出了这个号召，并且本着他重视实践的精神，立即行动起来。五月二十一日，他和战友们发起组织“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团”，他并拟订了《学生实行提倡国货办法大纲》。其中规定：“本团之事业：（一）入团者非不得已不用外国货，且不用以外国原料制造之物品。对日货尤绝对排斥；（二）对社会于提倡国货尽调查劝告扶助之责。会员迂不得已购用外货时，应向本会事务所申请，否则查出罚办。”〔34〕在恽代英同志等的推动下，武汉地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单纯靠散发传单已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为了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在恽代英同志领导下，武汉学联宣传部出版了《学生周刊》。其发刊词满怀爱国激情写道：“嗟我中国，强邻伺侧，外交紧急，河山变色。壮哉民国，风起云蒸，京津首倡，武汉继兴。维我学界，风潮澎湃，对外一致，始终不懈。望我学生，积极进行，提倡国货，众志成城。力争青岛，事出至诚，口诛笔伐，救国之声。愿我同胞，声胆俱张，五月七日，勿忘勿忘。”〔35〕这个不足百字的“发刊词”，阐明了学生运动的宗旨，起到了进一步动员群众起来参加斗争的作用。《学生周刊》只出了一期，即被军阀封闭。到六月间才复刊，复刊时恽代英同志写了《改进学生报的办法》，以后并为它写了一些评论。

六月初北京学生运动遭到军阀镇压的时候，湖北军阀王占元也对武汉学生运动进行

了血腥镇压，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六一”惨案。“六三”以后，全国的运动进入了新阶段，由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广泛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这时恽代英同志和战友们为了把运动扩展到各阶层去，首先着手发动商界罢市，使学生罢课运动和商民罢市运动结合起来。在六月七日举行的各团体联合会上，恽代英同志号召商界行动起来，参加爱国运动。他还写了《为什么要罢市》、《罢市目的与办法》等传单，向商界说明罢市可以争回青岛；可以挽救利权；可以惩罚卖国贼；可以表示爱国心；可以取消亡国密约；可以救被捕学生；可以不做亡国奴；可以提高人格。为了避免反动军警的干涉，学生们在深夜把传单从各商店的门缝插进去。另外还写了一些宣传罢市的纸扇，挨户挨店传观。在恽代英同志和学生们的鼓动下，十一日汉口实现了罢市。次日，武昌商民在恽代英、施洋同志的发动和汉口罢市的推动下也举行了罢市。

北洋军阀政府在工人阶级投入战斗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在十日上午下令准曹汝霖“辞职”以缓和群众的情绪。恽代英同志认为仅免去曹汝霖职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他要求“一扫政治界中之妖气。”〔36〕他还认为，曹汝霖虽已免职，但不等于斗争的结束，并且强调指出：“重要之事，在唤醒工商界及多数平民”〔37〕，坚持不懈的斗争。

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恽代英同志在武汉地区的爱国运动中起了重要的思想领导作用，是武汉地区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正因为这样，反动派对恽代英同志恨之入骨，企图以解职相威胁。恽代英同志对此无所畏惧，他在致校方的信中，坚决表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宁可牺牲自己，决不使全校师生受累。由于他的坚决斗争，使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

群众爱国运动的巨大声势，也使一些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严重动摇起来。他们甚至把革命群众诬蔑为“乌合之众，不可与谋”，还说什么搞群众运动是提倡“侥幸心理”。恽代英同志在七月十六日写的一封信中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谬论。他认为在当前“危急存亡之秋”，如果国民不觉悟，就会要亡国；如果全国“毫无举动”，就会“从此任日人支配”，群众爱国运动起来了，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加以遏折，是“绝对非法”的。他指出：“平民之思潮，乃吾人所以立国，……今日群众，本渐有平民思想之觉悟，正可因势利导。”认为群众是“乌合之众，不足为谋”是错误的，只有不顾“国亡种灭”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因为“除合群外”别无救国之法。〔38〕恽代英同志的这些言论，表明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启示下有了新的发展，他对群众和群众运动的看法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是很可贵的。

从五四前夕到五四爱国运动这段时间里，在恽代英同志的思想中，除了民主主义思想是其主流外，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五四时期，在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曾经是占优势的。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而中国是个小资产阶级极为广大的国家，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另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宣传较之马克思主义和其它各派社会主义更早一些，也是一个原因。当时在知识分子中不仅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多，即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李大钊同志，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也不免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由此可见，恽代英同志作为一个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当时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

恽代英同志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但是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39〕从这个时间推算，他在一九一三年，即进入中华大学那年已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了。从他当时的言行看来，他主要是受到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的影响。但是在五四爱国运动前这段时间里，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他言行中表现并不多。一九一七年，他组织学生社团时把它定名为《互助社》，并出版《互助》内部刊物。这显然是由于克鲁泡特金“互助”思想的影响。但是“互助社”提出“改造环境，改造自身”〔40〕的宗旨，主张在学习和修养上互相帮助，共同进行新思想的研究和传播。由此看来，不能说“互助社”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后来，恽代英同志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组织这个团体，还不过是一方督促自己学业品行上的进步，一方帮助朋友，有时亦做一点为社会国家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主义的信仰，更不知道甚么叫国民革命。……然而这个团体便是我们开步走的第一步了！……我们的团体开始向同学公开，而且我们的会员每天互相督促的向同学们作各种实际工作，我们开始组织了一个小图书馆，而且帮助同学很努力的做了一次调查国货的运动，平常对于同学作各种有益的谈话。”〔41〕

一九一九年四月间，恽代英同志在日记中写道：“吾自信无政府主义，即信当即刻为之实际之予备。当以建设为破坏之手段。当速养民智民德，即大同生活之习惯，当使不正当阶级畛域，自然消灭”。〔42〕同年五月间，他在日记中表示他不赞成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均产之见”，而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之见”〔43〕。由此可见，他主张立即为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作准备。他强调“建设为破坏之手段”，表明他不赞成暴力革命，而主张从“培养民智民德”着手，以达到消灭阶级，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的理想。

但是恽代英同志在日记中同时表示他不愿标榜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愿与一般无政府主义者“强称为同志”。他认为，如果旗帜鲜明地在人前自称自己为主义家，“必使他人视我为异类，则我之主义反不能行。何若不露色相，以赢其同情，渐求其同化尚不循循善诱之旨。”〔44〕正因为这样，恽代英同志没有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的团体，在他写的大量文章中也极少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

综上所述，可见恽代英同志从大学时代到五四爱国运动期间，思想是复杂的。民主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同时存在，但是从他的言论和实践活动，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实践活动看来，民主主义思想是他的思想的主流。这时他是一个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二

五四爱国运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不仅摆脱了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丢掉了对军阀政府的希望，同时也开始认识到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抛弃了对他们的幻想。因此，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这就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此同时，在国际上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和殖民地附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五四”前已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中国文化思想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新刊物

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人们广泛地谈论着各派思想学说，讨论着各种问题。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不可避免地出现各派思想的交锋，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赢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五四爱国运动以后的两年间，恽代英同志在思想上，在行动上都是很活跃的。一九一九年九月，他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且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一九二〇年二月，他创办了“利群书社”。同年秋，他到安徽宣城任第四师范教务主任，积极从事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革命活动。次年被安徽军阀当局戴上红党帽子，下令通缉。一九二一年一月，他与黄负生、刘子通、李书渠等同志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同年四月又与林毓南、廖焕星等同志创办了“利群书社”的内部刊物《我们的》。他在这两年中写了大量的文章和通讯。从他这两年的言论和实践活动看来，他的思想仍然是复杂的而且以克鲁泡特金“互助”思想为基础的新村主义的思想突出起来。但是从一九二〇年春天以后，他的思想开始酝酿着新的变化，开始着重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到一九二一年七月终于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转变。

五四爱国运动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广大人民群众从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时，恽代英同志对旧礼教和宗教迷信思想进行进一步抨击。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发表的《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枕头上的感想》两文中，把妇女在封建家庭中被蹂躏被奴役的悲惨状况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他说，一个女人活在世上简直有说不完的痛苦。当她从娘胎里一生出来的时候，他就受到人们的欺侮。……如果是生在一个深受封建遗毒而毫无人性的家里，甚至可以被人拿去放在塘里淹死。即使这样，大家认为也是应该的。如果她侥幸地活了下来，那也是不被当人看待的。首先，她就不能和男孩子一样受教育，因为她将来横竖是人家的人，受了教育又能有什么用处呢？其次，在成长结婚以后，她所遭受的痛苦，更是笔墨难以形容。……更倒霉的是，她一定要生儿子，生女儿都不算数，否则人家便会奚落她，说她‘不贤惠’。她的丈夫甚至可以把她抛弃，另外再娶，她也不能过问。因为‘她自己没出息’她不能‘教丈夫犯杀千刀的不孝之罪’。总之，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女人从出生到老死，随时随地都在受着歧视和侮辱。她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受人重视的最下等的地位。她在家庭中过着奴隶般的非人的生活。”〔45〕这些言论表现恽代英同志这时对封建的家庭制度，对旧礼教的抨击比过去更为激烈和尖锐。

对于宗教迷信，他也作了进一步的批判，反复强调了破除迷信思想，对于人们认识真理的重要性。他指出：“虚伪的宗教信仰，亦是不能用以安心立命的，因为人类没有肯死心塌地信赖那些不可信赖之事的道理。我们只要越肯从理智上研究，便越见上帝的存在是武断，是迷信。”他还指出：“从人类进化上看，显然可知理智是引我们趋福避祸的明灯。人类因为理智的逐渐发展，逐渐纠正，所以知道善处现在，预测将来。”“人类需要最彻底的真理。最彻底的真理不但能指导人的路径，而且能安慰人去走这一条路。”他并指出，这个真理就是社会主义。他说：“我们应当从生物进化方面看出人类，只应该遵循社会主义的生活。”〔46〕他在这里虽然表现了把进化论用于人类社会的庸俗进化论的观点，但是把反对宗教迷信与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联系起来，这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特点，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进步，虽然这时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五四爱国运动以后，虽然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冲破了封建主义思想的樊笼，

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思想上仍然受着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对旧八股、旧教条不敢怀疑，对新事物甚至不敢接触。而有些接受新思想的人，又往往对新思想未进行研究就全盘接受下来，而不愿去继续研究新学说，追求真理，这些都是阻碍新思想的传播，阻碍人们认识真理的。一九二〇年四月，恽代英同志发表了《怀疑论》一文，阐明了他在一年前就已有了的怀疑的思想。他首先说明这篇文章标题为《怀疑论》，但不是要传播希腊哲学家辟罗的怀疑论思想。他仅认为辟罗所说对一切事理都应持一个怀疑态度，“是可信的真理。”他指出：“现在伦理学上已经决定的理论，都值得重新考虑一番，那以为无怀疑余地的，简直是自欺了。”“教科学进步的是怀疑”，不能说科学中无怀疑的余地。而这“不是说现在事理都是错的，违反现在事理的事理都是对的，然而一切事理总应该用怀疑的态度对待他，总不应说无怀疑的余地。”他强调：“世界各方面的进化，都起源于怀疑。”因此，他反对武断、迷信，反对依附于偶像，主张“对于事理不轻可决，不轻否决。无论什么天经地义的律令训条，无论什么反经悖常的学说主张，我们总是一律看待，这便就怀疑。”“世界将来若是能有进化，这便是促世界进化的唯一工具。”他“奉劝学者都慎重些，常预备欢迎新学说到我心里来，亦欢迎他到我耳朵里来，能欢迎新的，还应该欢迎新的。”〔47〕

同时，他强调他对辟罗“所说真事理不能研求出来，而且不必研求出来的话，根本上很反对。”他认为“人类的研究真事理，与人类幸福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怀疑的事理，应该研求，而人们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也是可以认识真事理的。他说：“照历史上看起来，人智是一天天进化的，倘若有个甚么人智范围，这范围一定有随时代以扩展的可能性，一定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智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人类只要肯前进，我虽不敢担保他有一天得着他所求的真事理，照以往的推测未来，应该是很有希望。那以为真事理一定是不能研究得到的话，总是错了。”〔48〕

对于“我们有什么法子知道他究竟是真事理不是”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的法子是反省、研求、是注意新出的反对意见。”〔49〕他当时还不可能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实践在人们认识真理上的意义。在谈到道德标准问题时，他说：“我们一方面力行，一方面仍须随地反省，随地考察反对意见，总教我们由较不善的道德标准、到较善的道德标准。”因此他强调实践，他相信“道德便是人生幸福的路，”认为“知道他是幸福的路不去实践，这是愚蠢。因为观望一个更大幸福的路，便不去实践眼前较小幸福的路，这亦是愚蠢。”〔50〕

列宁指出：“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51〕恽代英同志的怀疑思想包含着怀疑的因素，但与怀疑论根本不同。他的怀疑思想与辩证法所包含的怀疑思想大体上是一致的。恽代英同志的怀疑思想对于人们解放思想，冲破旧八股、旧教条的束缚，研究和接受新事物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对于他自己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前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恽代英同志这时虽然对“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新村主义已有了信仰，但他仍然欢迎新学说到他心里来。五四爱国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恽代英同志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也开始从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一九二〇年春，为了广泛阅读各种书报，他由武昌到了北京。在京期间，他与李大

钊、邓中夏同志等建立了联系，讨论了革命问题。这对于他思想上开始出现新变化，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有影响的。同年四月，他向“少年中国学会”提出研究各种主义的主张。学会推举他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他建议学会成员把自己爱读的书开列出来。他自己首先提出了他准备进一步钻研的各派学说和各种问题，其中包括：“马克思及其学说，罗素及其学说，杜威及其学说，达尔文及其学说，蒲鲁东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德道的起源，优生论，布尔什维克，劳动问题，乡村小学教育，安那其，国际运动，克鲁泡特金及其学说，太戈尔及其学说，哲姆士及其学说，尼采及其学说，康德及其学说，实用主义，生物进化论，德谟克拉西，新村运动，女子问题，中学教育研究，日本，群众心理”〔52〕从这些题目，可以看出恽代英同志当时思想活跃的状况。他要广泛地研究各派学说，对他已经有了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也还要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布尔什维克”，“劳动问题”等都列入了研究项目，而且他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及其学说”。这反映了这时他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还在一九一九年底，他就受《新青年》杂志社的委托开始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书。这本书是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解说。这个“纲领”是考茨基起草的，是一八九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在恩格斯和倍倍尔的支持下通过的。在这个纲领中虽然还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它完全没有涉及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它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它肃清了拉萨尔主义，其理论部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恽代英同志翻译考茨基解说《爱尔福特纲领》的这本书，对于他自己和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起过重要作用的。毛泽东同志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53〕接着，在一九二〇年秋天，恽代英同志又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内容，以《英哲尔士论家庭起源》的书名发表。他并在《译者志》中写道：“英哲尔士为马克思的挚友，终身在宣传事业中联合努力。读马氏传的，无有不知他的。”〔54〕表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崇敬的心情。

五四爱国运动以后，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造的讨论非常活跃。恽代英同志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写了《论社会主义》一文，就他自己的意见，“综括以叙述社会主义应当的旨趣。”他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仍旧可以分为三派：一、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二、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三、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所谓“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便是一般政治家所谓社会政策。他们一切对于社会的设施，全然以国家利益为着眼。所以他这并不是真诚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国家主义。”〔55〕关于所谓“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认为有两种：一新村运动，一阶级革命运动。关于新村运动，我们在后面再来说它。他所以说阶级革命运动是个人主义的，就因为他认为“现在所通行的阶级革命学说都只注意唤起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嫌怨，使劳动阶级为他个体的利益，联合、抗拒、奋斗。”而他相信“人类的共存，社会的联带，本是无上真实的事。”他认为“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因为人类只有知道人群的真意义，才能为社会福利去求社会的改进。这才可望是社会上长久治安之道。”〔56〕很明显，由于克鲁泡特金“互助”思想的影响，他不主张提倡阶级斗争，而主张提倡“互助”。正是这种影响，障碍着他接受科学社会主

义思想。

恽代英同志还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从学理上产生的”而“是从感情上产生的”“初不过一般受掠夺者的阶级，因为得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物质痛苦，遂认识了地主资本家的罪恶，要求一个改善的法子罢了。群众的心理易受感情的激发，难受理智的启示，”于是产生了现在这种易于提倡，易于传播的“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这样也就使他所谓“理性的社会主义”得不着适当发展的机会。”而他主张的理性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他所谓“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就生物学理上说，就经济状况上说，个人只是人群的一个分子，一个细胞，离开人群，个人不能生存，亦似乎没有生存的意义。说简直些，在我们所踪寻得的宇宙大法中，个体是为全类存在的，全类不是为个体存在的。这样，所以人群比个人在宇宙中更有个真实的地位。”“所以要图世界的长治久安，必须使每个人看清社会福利的重要，每个人能抱着社会主义的精神，去做社会主义的运动。不然，便令资本家打倒了，人类各部分的利益，仍然得不着他的平衡，又要生出别的冲突来。”因此，他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不仅是劳工的不平之鸣，不仅是被掠夺者的企谋报复的举动。这是在学理上，事实上，有圆满根据的一种人的运动。一切社会主义的运动都须从这一点着眼，才可谓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总之，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根据是“人类是共存的，社会是联带的。我们要求个人的幸福，必不可不求全人类的幸福。那便是说，只有人群，只有社会是唯一的自然的实在，亦只有他配得上做宇宙同一事物的中心。”〔57〕

从他的这些言论看来，他是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作为他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但是他不是象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认为人类有这种“互助”的本能，人人可以自己管自己，个人的自由不应受到限制，否则，人类的本能就不能发挥，社会的进化就要停滞，因而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所以他认为“世界的未来，不应归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乃应归于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58〕

无政府主义者，一般从个人的绝对自由出发，坚决反对一切强权，首先是反对国家政权，恽代英同志也有过反对国家政权的言论，但他是从国家政权妨碍人与人的互助着眼的。他说：“国家是离间人与人的恶魔”〔59〕他还说：“若要政权，一定不能无滥用权力的事，想干涉受治者私有的冲动，却发生了治者私有的冲动。”即使政权减到最小的限度，“然而要一方能尽干涉的能力，一方又不至无多少的滥用权力，亦是不容易的事。何况要留政权的先决问题，先是不能成立的话。”〔60〕

恽代英同志主张革命后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也是与这种“互助”思想有联系的。他认为：“社会上一切纠纷的事，其实虽似乎无从解决，亦似乎无法遏制，究竟亦没几大不了的事。只要破除私有制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工作；废除金钱，便一齐解决了。”〔61〕显然他认为私有制和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均阻碍了人们的平等互助，只要废除私有制，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们就平等互助，社会上一切纠纷就不会有了。

从以上所述，可见“互助”的思想是恽代英同志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

同时还可以看到恽代英同志这时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同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62〕的无政府主义是有区别的。所以他并不愿与主张无政

府主义的人谈论无政府主义，因为他认为“他们多半是激烈的急进的，严格地说起来还怕是空谈的，似是而非的，所以同他们说了除了惹些批驳同嘲骂以外，亦没有甚么好处。”〔63〕

恽代英同志认为空洞地宣传无政府主义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说：“我不同不知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因为说了除挑起辩难同惊疑以外，没有什么好处。”他认为“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使人们也有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精神，他们“自然有日会懂安那其的。”〔64〕

恽代英同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同新村主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在五四时，有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同时受到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恽代英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受到新村主义的影响也是不足为奇的。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就曾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睦的新村，以便进行改造社会的探讨。他和蔡和森、张昆弟等同志“踏遍了岳麓山下的镇子和村落想寻找一块适当的地方作为新村的试验场所”。只是由于找不到这样一个地点，“新村的设想终究没有实现。”〔65〕

恽代英同志既已受到克鲁泡特金“互助”思想的影响，就更容易接受新村主义的影响。因为武者小路实笃正是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下，提出他的新村主义思想的。

五四爱国运动以后，在改造社会的呼声响遍中国大地的时候，恽代英同志力图将他的新村的理想付诸实现。一九一九年十月他在日记中热切地表达了他对“新村的企望”，并为组织新村与他的战友交换了意见，作了很具体的设想。他说：“我与香浦谈，都很赞成将来组织新村。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的生活。所以需费不多。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举一个人做会计，专管对外金钱出入的事，举一人做买办，专办向外处购买或出售各事。村内衣服，都要一致，能男女都一致更妙。会食在一个地方，设图书室，工作厂。对内如有女子儿童的教育事业，应该很很注意，因为是新村全体幸福所托。对外鼓吹文化改造环境的事业，亦很需注意。我想我们新村的生活可以农业为根本，并兼种果木，并营畜牧，这样做去，必然安闲而愉快。”〔66〕他还为他所设想的这种美妙的新生活作了一付对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67〕正因为他对建设“共同生活”的新村是如此向往，所以他曾想把“共同生活运动”作为自己“终身欲从事之事业。”〔68〕一九二〇年十月，恽代英同志在他所写的《未来之梦》一文中提出了建立新村，即所谓“共同生活”的设想。他想“组织合理限度劳动的工厂，既不纯为求利，那使工作时间，工人待遇，权力从理想方面办”，“这样似乎资本家不能相敌，我们便靠这长驱直入，打破资本阶级”。而“最好莫为利用经济的原理，一方用实力压服社会，一方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于一般阶级”。他还想“靠这种共同生活，四方扩张，把全世界都变做社会主义的天国。”〔69〕但是，恽代英同志认为他想要建设的新村与当时的新村运动是有区别的，他把当时的新村运动归属于“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且认为这种“新村运动，虽不纯然起源于寻求个人的幸福的动机，但因为利己的本能得了个合宜孳生的场所，利他的本能因为遇不着适当的刺激，遂得不着适当的生长。所以精神每易太趋重了对内的完成，太疏忽了对外的发展。结果一部分的成功，无益于全世界

的改造。而这一部分的生机，亦每为别部分恶势力所摧毁挫丧，不能继续存在。”⁽⁷⁰⁾ 他要根据“互助”和“改造社会”的目的来办新村。他认为这样的“新村运动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可以制造出共存互助社会的雏形”⁽⁷¹⁾ 他所理想的新村不是为谋个人幸福的，不是与世隔绝的，不是逃避现实的，而是具有崇高的社会目的。这种思想清楚地表现在他把建立“共同生活”的新村与社会服务——改造社会，结合在一起。恽代英同志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写道：“我们的新生活，这是创办一个独立的事业，投身生利场合的第一步，实行一部分的共产主义，试办近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团体，看机会以尽力于工读互助主义，尽能力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他的办法，初步是共同生活兴书报贩卖。共同生活是以书报贩卖的赢余，及团体中分子此外收入的自愿投为共同财产者的金钱，为维持全团衣食住的费用，不过最初还只好顾着食住及洗衣，这以外制衣或其它杂用都暂时由各人自愿，这是事实上的无可如何。至于将来的希望，盼望将团员个人无论何方面的收入，都归为共同财产（但这都须出其自愿，不可有一毫勉强），无论何方面正当的支出，乃至养生送死儿童教育费都由共同财产中拨付，能到这样，便成了纯粹共同生活。”⁽⁷²⁾ 他还对书报贩卖营业项目作了一些设想，并认为“这种营业固然一方面是为维持大家的生活，一方面亦是做个文化传播的机关。所以，凡有好书无论销行与否总得办到，常为社会多数或少数人求他对于改进事业所需要的书又不买的人，尽可以在营业的地方观览，算兼办了图书馆一样，因为我们原不是做计较锱铢的商人，我们做商人原另有别的目的，所以我们始终不应该忘记博爱互助的意思。”⁽⁷³⁾ 随后他与廖焕星、李书渠等十二人发表了《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的宣言，主张“创办一个独立自给的共同生活”，作为举办“一切社会事业的根基。”⁽⁷⁴⁾

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的思想指导下，一九二〇年一月恽代英同志去北京参观了北京工读互助团。二月，恽代英同志等拟定和公布了《武昌工学互助团组织大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组织工学互助团的计划没有实现。同月，恽代英同志以他译书稿费四百元在武昌横街头十八号创办了“利群书社”，经售各种新的书报刊物，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共产党》、《新青年》、《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许多进步青年经常到这里来阅读革命书报，研讨革命理论，进行革命活动。因此，书社实际上成了武汉地区传播新的思想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成了武汉进步青年活动的重要场所，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在“利群书社”的帮助和影响下，还组织了武昌利群毛巾厂以及汉口致忠互助社、武昌日新社、人社、诚社、黄社、兼爱社、启明社、健学会等进步社团，这些团体以“利群书社”为中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一九二一年四月创办的“利群书社”的内部刊物《我们的》，对于社员间讨论问题，交流思想，互相促进起了积极的作用。恽代英同志曾说过：《我们的》是“我们在武昌效死运动的写真”。⁽⁷⁵⁾ 同年五月一日“利群书社”曾在洪山上路省林区植物园内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

“利群书社”和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文化书社”派人向“利群书社”成员介绍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利群书社”也派人去帮助“文化书社”筹建织布厂。毛泽东同志请恽代英同志作“文化书社”的信用介绍，以便“文化书社”向外埠订购图书时免去押金。“利群书社”是“文化书社”在省外营业来往最

多的单位之一。一九二〇年夏，恽代英同志还亲赴湖南，访问了长沙、衡阳和新城的煤矿区。

除了办“利群书社”外，到一九二〇年冬，恽代英同志进而认为办乡村教育是“共同生活”的“根基”。他说：“以后拟从乡村小学教育立团体事业共同生活的根基，渐成大本团体以征服资本家，实现社会主义”〔76〕而他主张把办乡村教育作为“共同生活”的“根基”是与他的视“教育是改造的唯一切实的工具”〔77〕的思想分不开的，是他受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具体表现。

一九二一年二月，恽代英同志和林毓南、林毓英、林洛浦、唐际盛等同志在黄冈县农村恢复了濬新小学。据他们自己说：在学校教育中，“注重实地观察，野外生活，自治互助，乡村实用，尤注意学生的成绩，能为我们的运动——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加有力的生力军。”教历史“使学生知道历代文物制度的变迁及进化，使其藉历史了解了前社会，批评现代的社会，推演将来的社会，这就是我们把历史当作引导学生信仰我们所抱主义的工具。”除了拟制国旗外，还制了互助旗一面，并以“互助”作为校训，“总之，我们这完全打破权利义务的观念，是我们主义上的第一次的大努力。”〔78〕恽代英等同志从事乡村教育运动虽然是在新村主义思想影响下进行的，但是这些活动对于他们认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他的一位战友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因现行经济制度的束缚与压迫，新村的梦想当然不能成功，然农村运动却引起了我们不少的兴味，且得了不少的经验。”〔79〕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五四爱国运动以后的两年中，恽代英同志的思想受克鲁泡特金“互助”的思想和新村主义思想影响是很深的。在实践上建立新村的活动也是颇积极的。这些思想对他正确认识十月革命的意义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着阻碍作用，是他比同时期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稍迟一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但是，更应该看到，他在从事新村活动的过程中，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实际，特别是通过利群毛巾厂和在乡村办教育，接触了工农群众，了解了他们的疾苦和要求，这对于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恽代英同志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抱负，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不是停止不前的，而是以进取的精神，不断地进行探索，即使他热中于新村的试验的时候，他仍然努力学习各种新学说，学习“马克思及其学说”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他很重视实践，而且能不断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改正自己的错误认识，因而能跟上时代的主流前进。

恽代英同志由于存在改良主义思想，所以在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初期，在通讯和文章中，多谈论社会问题（如教育问题等）、社会活动（如工读互助等）和个人修养问题，而很少提到政治活动。但到一九二〇年七月，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中，他说：“我想只要平情达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动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避免的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或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80〕表现了他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观点开始持否定的态度。

这时，社会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正在进行一场大的论战。共产主义

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有力地批判。这场大论战对恽代英同志的思想变化起了促进作用。他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写的《论社会主义》一文中，明确地否定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并说“我知道这里所说，与我以前所说相矛盾。但这，我信或者是进一步的觉悟。”〔81〕

恽代英同志通过自己的实践和他的战友们的影响也开始感到靠“共同生活”从事办教育事业来改造社会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一九二一年四月，林毓南同志在北京给恽代英等同志的信中谈到他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个成员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和他自己的主张，他认为“阶级的利害大相冲突了，仅用和平的运动奏效甚难而且太慢，所以一方面不可不用破坏的运动。”〔82〕这个思想对恽代英同志是有影响的。同年五月，恽代英同志在给沈泽民同志等的一封信中认识到：“教育问题正和一切问题一样，非把全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得会解决的。”〔83〕北京工读互助团办了几个月就瓦解了，“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之一王光祈把失败的原因完全归于“人的问题”即人的品德修养问题，而抹煞其失败的经济原因。一九二一年六月，恽代英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他通过一年来办“利群书社”的经历，认为过分强调“人”的问题是不对的，经济上的原因是重要的。他说：“以我一年来利群书社的生活，深信都市中作小工商业，实有不免受经济压迫的地方。至于没有能力的少年，必要合起来做工自给，我真想他们牺牲了读书，还不知能否不受生活恐慌。我们还有些朋友在武昌作各种小工业运动，有的失败了，有的很谨慎养很少的人，还不过才可维持。我们真饱受了经济压迫的况味，不知你何以这样轻看这些问题？”〔84〕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二一年六月，在“利群书社”内部，展开了对“共同生活”的讨论，林毓南同志等写信给恽代英同志不同意“共同生活”的主张，指出：“共同生活不能实现，亦无实现之必要。”同时批评了恽代英同志《未来之梦》一文中的观点。他说，靠这种共同生活把全世界变成社会主义的天国和靠组织合理限度劳动的工厂打破资本阶级，只是“空想”。最后严肃地指出：“我们这种理想是仿佛对的，但审察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久是个‘理想’终久是个‘梦’啊！”〔85〕这些意见对于恽代英同志克服新村主义思想的影响，无疑地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由于接触了工农群众，由于自己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恽代英同志的思想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恽代英、林毓南、李求实等同志的倡议下，在黄冈潘新小学召开了“利群书社”及与其有联系的各团体代表大会。恽代英、李求实、林毓南、林毓英，廖焕星、李书渠等同志参加了大会。恽代英同志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大会决定成立“共存社”，并确定其宗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争斗，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86〕很明显，这个宗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提出来的。从这个宗旨，我们看到恽代英同志这时不但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愿为它的实现而奋斗。这次会议是恽代英同志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就向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迅速前进了。

三

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后的两年间，恽代英同志迅速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领导青年运动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共存社”成立大会后不久，一九二一年十月，恽代英同志应邀去四川泸州师范学校工作，先后担任教务主任和校长，并先后介绍李求实、肖楚女等同志到该校任教。这时少年中国学会因马克思主义者与国家主义派之间的斗争正面临分裂的局面。十一月间，恽代英同志在一封通讯中，一反以前调和的态度，一反过去不同意有统一的主义的主张，认为学会“有树立一定明确旗帜的必要，实无调和的余地”，明确主张“学会非分裂不可”。由破裂“以达到最高的希望”。〔87〕而他的最高希望也就是把学会改造为布尔什维克式的团体。他说：“我私意近来并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的团体。”〔88〕这个思想上的变化，的确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他的“思想的大改变”。〔89〕这不仅表明他已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希望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团体从事实际革命斗争。

正是由于恽代英同志有了这样的思想大转变，所以此后不久，他就在四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加积极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六月，为了争取“少年中国学会”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会员转向马克思主义，他写了《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一文，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改良主义，宣传依靠群众，用革命方法改造社会的思想。他首先指出只有用革命方法推翻旧的经济制度，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说：在旧的经济制度之下，“人们全靠榨取掠夺，才能营谋他的生活。全靠能受最能榨取掠夺的阶级——资本阶级——役使，才能保全他的地位，一种不正当的经济关系，是许多人的生活问题之所倚托。所以无论贵族或资本家，他们自身不能不榨取掠夺人家，即他们的附属物亦要用各种法子欺骗引诱使他不能不榨取掠夺人家。我们在他们手下做事，想对于他们的榨取掠夺，根本加以纠正，无论这是他们本身所不容许，他们的附属物更要拼死的倔强反抗。所以倚赖他们的势力，想作一点正当事业只当是与虎谋皮，完全没有希望的事”。“我们不可真望我们在旧社会下面，作理想的政治家、实业家，乃至理想的教育家。因为在这样不合理想的环境中，想在一局部作成什么理想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改造需全部改造。须将眼前不良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加一种有效力的攻击，不然总是没有益处。”他还以自己实践中失败的教训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说不利用旧势力的建设事业，这句话是再精确没有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经营新村事业，用我们最纯粹的血与汗来凭空的制造一个世界。……我以前亦有一种错见解，以为我们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的事业。然而结果只有挫折与失败。说到办生产事业吧，用我们的小资本去经营，一方终不能不多少窃取些资本家的伎俩，以维持那很小的根基；然一方却备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终于那很小的根基都维持不住。（我们营生产事业原为的是盼望他能作别种改造运动的经济帮助，不然便更没有意义了。）”因此他明确指出：“旧社会的罪恶，全是不良的经济制度所构成，舍改造经济制度无由改造社会。”“我们在旧社会的努力，无非是破坏——有效力的破坏——有建设把握的破坏。”〔90〕

由此他进而回答了依靠什么力量改造社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应该如何改造旧社会？我们应得利用一种力量。自然我们不能利用贵族或资本家的力量……自然我们亦不能轻

易的利用武人的力量。……什么力量能抵抗而压服贵族资本家乃至武人的力量，也能够受我们的利用呢？我可以说，这只有群众的力量。”“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无抵抗的劳动者，集合起来，占优势的资本家，不能不屈服。若各国罢工的胜利，赤俄革命的成功，这亦是普遍眼著的事实。”“群众集合及他的本能的冲动力量是我们改造的唯一的武器。”他也从自己过去实践失败的教训来说明他们过去脱离群众，“用我们少数人……不容易作一点有效力的运动”，看不到身边“本来有硕大可以利用的力量”，走的是“窄路死路”。因此，他指出：“我们应研究唯物史观的道理，唤起被经济生活压迫得最利害的群众，并唤起最能对他们表同情的人，使他们联合起来向掠夺阶级战斗”“冷静、周到、敏捷、决断的指导群众，是我们的责任。”〔91〕

从上述可以看到恽代英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勇于进行自我批判，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后，就能对自己过去思想上和实践上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并且由此而使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较深刻的体会和阐述。

恽代英同志在四川泸州师范工作期间，除了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曾利用寒假，领导该校讲演团至隆昌等地讲演，传播革命思想。在这期间，他曾被军阀扣留。当时在成都任高等师范校长的吴玉章同志早知道恽代英同志是个进步青年，就将他保释出来，并聘他为高师教员。他在高师继续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杨闇公同志在他的日记中曾谈到对恽代英同志的看法是“此君谈话很有真理存在，……他非常注意向民间去工作，与我所主张很相同”。〔92〕一九二三年秋，恽代英同志离开四川去上海专任党的工作，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及《中国青年》杂志主编。这年十二月他在《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一文中，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批判了一些伪社会主义学说。他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明此理，须知人类自始并不能完全用理智构成国家社会之组织，此等组织，不过由物质进化自然形成。人类之理智只能略加修饰。理智之有力，必系以其符合于有力的阶级之所要求。例如自机器工业流行以后，资本家一方固能利用其私有的机器工厂以役使工人，工人并渐聚集而占有经济上重要地位，成为一种伟大势力”，故至此社会主义思想“乃因而大盛行起来”。“马克思因见实力已渐转移到劳工方面，故信劳工阶级必然胜利。理智的社会主义非物质进化到此田地，不能影响于社会的组织。”因此，他强调马克思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说，“系谈社会主义的根本义，不可不注意研究。”他批评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与基督教社会主义都是“无益的空话”，“完全应受排斥”。他还指出当时中国有不少信仰无政府主义或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人“亦自附于安那其派或马克思派。然而他们反对物质的改造，反对革命，只知做空文章，说废话，甚至吟几句怨骂诅咒的诗歌，这只是无聊的流氓而已，不要受他们的欺骗，亦认他们是甚么‘主义者’”。〔93〕从上述恽代英同志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到他这时已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恽代英同志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两年的实践表明，他虽然比与他同时期的某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要稍迟一些，但是他一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真理，他就立即加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勤奋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后，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总而言之，恽代英同志在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

革命知识分子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时期，恽代英同志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由一个受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思想影响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这个时期所表现的要求民主和民族独立的革命精神，孜孜不倦的追求真理的精神，重视实践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他取得上述成就的基本因素，也是我们应当永远学习的。

注：

- 〔1〕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三日日记
- 〔2〕《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 〔3〕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日记
- 〔4〕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七日日记
- 〔5〕〔6〕载《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七号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五日
- 〔7〕〔8〕〔9〕〔10〕〔11〕〔12〕〔13〕〔14〕《新无神论》，载《光华学报》第一期
- 〔15〕〔16〕〔17〕《论信仰》，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
- 〔18〕〔19〕〔20〕〔21〕《物质实在论》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
- 〔22〕〔23〕〔24〕〔25〕〔26〕〔27〕〔28〕《经验与智识》载《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十号，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
- 〔29〕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一四四页

五日

- 〔30〕载《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九号，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 〔31〕载《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 〔32〕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日记
- 〔33〕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日记
- 〔34〕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
- 〔35〕见《大汉报》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 〔36〕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日记
- 〔37〕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七月五日日记
- 〔38〕以上引文均见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六日日记
- 〔39〕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三日日记
- 〔40〕《“五四”前后的恽代英同志》，载一九六一年五月四日《武汉晚报》
- 〔41〕《应该怎样开步走？》载《中国青年》第九十六期，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 〔42〕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至八日日记
- 〔43〕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日记
- 〔44〕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至八日日记
- 〔45〕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一四七页
- 〔46〕以上引文均见《我的宗教观》，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
- 〔47〕〔48〕〔49〕〔50〕均见《怀疑论》，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
- 〔51〕《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一四三页
- 〔52〕恽代英同志致少年中国学会同人的信，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二日

- 〔53〕《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
- 〔54〕见《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九号，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
- 〔55〕〔56〕〔57〕〔58〕〔59〕均见《论社会主义》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 〔60〕以上引文均见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五日至十日日记
- 〔61〕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日记

- [62] 《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进化》第二号，1920年2月20日，转引自蔡韦著《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第九十四页
- [63] [64] 均见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三至十四日日记
- [65] 《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载《新湘评论》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 [66] 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一日日记
- [67] 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日记
- [68]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职业调查表》
- [69] 以上引文均转引自林毓南给恽代英的信，载《我们的》第六期，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
- [70] [71] 《论社会主义》，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 [72] [73] 恽代英同志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记
- [74] 《时事新报》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 [75] 《芜湖》第一号，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第四八三页
- [76]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职业调查表》
- [77] 《敬告高等师范教职员及学生》，载《少年世界》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
- [78] 以上引文均见《清华学校半年的经过》载《我们的》第七期，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
- [79] 林根：《黄冈的乡村教育运动》，载《中国青年》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第二十期
- [80] 《怎样创造少年中国》，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 [81] 《论社会主义》，见《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 [82] 见《我们的》第五期，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六日
- [83] 《芜湖》第一号，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第四八三页
- [84] 《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一年六月，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第二四六页
- [85] 以上引文均见《我们的》第六期，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
- [86] 《我们的》第七期，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
- [87] 以上引文均见致钟健的信，载《少年中国通讯录》第一期
- [88] [89] 致钟健的信，载《少年中国学会通讯录》第一期
- [90] 以上引文均见《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载《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二年六月
- [91] 以上引文均见《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载《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二年六月
- [92] 转引自《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十期吴玉章遗作：《忆杨闇公同志》
- [93] 以上引文均见《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载《中国青年》一九二三年第十一期

“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不怕失败的人，才是能取得胜利的人。”

“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也许那时年轻人，不易领会我们走过的令人难以设想的崎岖道路……。我们吃尽了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我们是舍得付出一切代价的。”

——恽代英
